

短篇小说

1979

《北京文艺》

短篇小说选



北 京 出 版 社

《北京文艺》短篇小说选

《北京文艺》编辑部编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直门内大街6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

*

78 × 1092 毫米 32 开本 11 375 印张 21,000 字

1980 年 6 月第 1 版 198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0

书号: 10071·276

定价: 0.75 元

序 言

《北京文艺》编辑部要我为他们编的这本短篇小说选写点什么，这本是难以应承的任务，因为由我来写“序言”，不免会产生一种猪鼻子插葱——装象的自我感觉。但是，给我分配任务的同志恰是我现在所属单位的领导成员之一，而积数十年之经验，我深知对待上司是需要恭敬并且从命的。再说，做为同行，我愿向这些小说的作者表示羡慕和敬意；做为读者，我也可以谈心得，说感想，评头论足，“歪批三国”。特别是，在经过“旗手”的一视同仁的“培育”，“文人相轻”的旧俗已经让位于“文人相亲”的新风的今天，信口开河，信手拈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不也是一件幸事、乐事吗？也许不致遭到太多的“物议”吧？

一九七九年九月，《北京文艺》出了小说专号。编后记中，编辑同志感慨系之地说道：“这些年来的小说荒，当编辑的确实感受很深……每临发稿，愁眉苦脸……”而现在呢，“……深切地感到我们的创作生机，恢复和发展得相当迅速。我们不得不增加一些篇幅，但还是不能适应来稿的需要……形势的改变很使人欣喜，如果要追本溯源的话，我们觉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起了重要的催化作

用……”这是实话。看一看这十几篇小说吧，仅仅从一九七九年《北京文艺》这一刊物上，就选出了这么多佳作，不论从题材的广泛、思想的深度、手法的多样、反映现实的及时……哪一方面来说，成果都是可喜的。中国确实是有人才，有文才，有潜在的文艺生产力啊！不论是十年的“踏上一只脚”，还是更早的“金棍子”和“钢帽子”，都没有也不可能彻底扼杀中国的文运，因为真、善、美在假、恶、丑面前虽然貌似软弱，貌似毫无还手之力（让我们回忆一下那书、手稿、绘画、歌谱在燃烧而作家和艺术家挂着黑牌子、揪着的情景吧），然而，归根到底，是真、善、美战胜了假、恶、丑，是文学战胜了现代迷信加暴力。文学的力量在于它对于真、善、美的追求，而只要有人民，对真、善、美的追求就保存在人民的心里。人心不死，所以文学不死。

粉碎“四人帮”以后，文学复苏了、发展了。在一九七八年的显著的进展之后，我们的短篇小说沿着愈来愈真实地反映生活的路子继续向前迈进，人民的希望、欢乐、苦恼和思索，愈来愈及时地表达在这些短篇小说里。实事求是，说实话，使我们的文学获得了新的生命，而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双百”方针的贯彻，艺术民主的空气初步形成，又使人们敢于尝试，敢于创新，敢于突破了，这就出现了不但超过十年浩劫时期，而且超过解放以后的任何一个时期的蓬蓬勃勃的创作势头。

在谈到这个集子的作品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了《内奸》。一九七八年初冬，方之同志把这篇稿子交给《北京文艺》的时候，他虽然带病，但仍是雄心勃勃，意欲有一番作为。谁知，饱受林彪、“四人帮”折磨的他，竟在一九七九年秋离我们而去。方之不愧是“探求者”的勇将，在《内奸》这部小说写作的前前后后，他虽也碰了些钉子，但他探求的勇气、锐气不减当年，这就使《内奸》在揭批林彪、“四人帮”的作品群中，颇有独到之处。他写了一个商人，一个好人，一个正面人物，一个比某些共产党员还要正派，还要有血性，还要有良心的爱国商人——他又确实是商人，“不干不净”，“连吹带炫”，具备“资产阶级”的特点。“左”的教师爷很可以用这么一两句话把方之的小说“枪毙”：“这是什么感情？难道无产阶级的英雄，共产党的英雄你已经写够了，写腻歪了吗？”但作者的用意就在这里：第一，田玉堂之所以有些可爱，正是党的工作，党的教育的结果；第二，林彪、“四人帮”破坏统一战线，迫害爱国人士的罪行应该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反映和控诉，在方之的小说发表以前，这方面的题材还是空白；第三，尤为重要是方之要告诉我们，林彪、“四人帮”这群人面东西实在太可憎了，甚至拽出一个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本来相当吃不开的私商，（当然与一般私商比，田玉堂就算“高大”得多的了）也比他们强万倍。愤怒出诗人，愤怒也出小说家。《内奸》是火一样的憎恨的果实。愤怒出悲剧，也出喜剧，出极富才华的讽刺：象田玉堂被审讯时，得知审讯者是“无产阶级

司令部派来的”时候，心里不由喊了声“哎唷，小菩萨！”象田玉堂被隔离时作者插叙道：“……全托也者，大约是指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天使般的保姆照顾着……”象用“永远健康”来指林彪，象说田玉堂肚里“只有榆面，没有理论”……这些描写和叙述，自然贴切，富有时代特点，既通俗又新颖，嘻笑怒骂，针针见血，令读者喷饭，令读者深思，令读者拍案而起，却又令读者怆然泪下，实在是讽刺的杰作。田玉堂在挨了三天毒打之后，哭诉道：“冤死我一个不要紧，今后打起来，还有谁敢掩护你们工作同志呢？”更是至情至理，肺腑良言！通篇小说出自方之的真情真知，发表之后，立即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和文艺界的注意，这不是偶然的。

控诉林彪、“四人帮”的罪行，表现人民的斗争的作品在这个集子里还收了《话说陶然亭》、《阳台》、《小薇薇》和《我的妈妈》。《话说陶然亭》把读者带到一种表面上悠闲自在、与世无争的气氛里，什么“茶镜”啦，“胡子”啦，“鼻烟”啦，单这些名词都给人以一种淡泊清心、陶然忘机之感。实际上，这几个老人充满了被冤枉、被迫害、被蹂躏的痛苦，更充满了忧国忧民而又报国无门的悲哀。这种痛苦和悲哀，最后，融汇到了“四五”运动的狂涛中去了。邓友梅写过不少质朴、真挚、清新而又富于革命情操的小说，但象《话说陶然亭》这样绝、这样脱俗、这样出奇制胜，使人耳目一新，却又读来全不费力的作品，在他的全部创作中，是理应占据一个独特的位置的。

技巧圆熟而又独树一帜的小说家林斤澜在保持他的小说的含蓄和趣味性，保持对于形式，对于结构和语言的精雕细刻的特色的同时，也在他的作品中表达了越来越多的愤怒。《阳台》对于林彪、“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批判，是十分辛辣的。“我”最后站到了“红点”一边，这是生活的辩证法对于林彪、“四人帮”的无情嘲弄。《小薇薇》出自一个新手瞿航，写得委婉动人，用儿童的天真无瑕的心灵和语言，对林彪、“四人帮”进行了血泪控诉。

这些作品，尽管写了黑暗势力一时的猖狂，写了人民的不幸，甚至写了死亡和苦难，但总的来说，仍然洋溢着对于人民，对于党的事业，对于生活的无比信心。不论田玉堂还是黄老虎，不论“茶镜”还是“胡子”，不论“红点”还是小薇薇，他们从精神上、道德上、智力上比那些被“永远健康”所器重的暴徒们优越得多。所以作品尽管有血有泪，却仍然给人以一种精神上、道德上、智力上的优越感，一种从容坚定、游刃有余之感。相比之下，有的作品虽然也取材于控诉，立意于批判现代迷信，却不免显得有点声嘶力竭，有点凄厉。个中长短是值得探讨的。

人们在揭批林彪、“四人帮”的同时，更把眼光落到今天，落到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新的矛盾，新的希望，新的征途与新的苦恼上。我们的许多作品不愧为时代的镜子，它们紧紧地反映着现实生活的脉搏。母国政的《我们家的

炊事员》在回顾十年浩劫叫人痛心疾首之后，更号召人们在今天的新长征中冲上去，挑起担子来。令人欣慰，令人鼓舞。作品的幽默和生活化的语言中，饱含着辛酸和幸福的眼泪，一丝不苟的人生态度和男儿报国的凛然正气。张洁的《有一个青年》和从维熙的《梧桐雨》，都写了受到伤害的青年，然而，充溢在两篇小说里的，已经不是抚伤痕而长叹（当然长叹那么两声也是很自然的），而是疗救这些伤痕，促使这些伤痕愈合，并且迎头赶上，为实现“四化”而贡献青春的愿望和信心。作品里充满了青年人的失而复得的理想、爱情和美好幸福的青春，读后叫人觉得暖烘烘的。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正在获得新的活力。陈建功的《京西有个骚鞑子》和祝兴义的《落霞》则不但反映了当前的新面貌，也反映了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京西有个骚鞑子》有理有节地反映了工人群众和某些沾染了官僚习气，不负责任，遇矛盾而“溜”的干部的斗争，恼人的实际问题，气人的“溜主任”，插科打诨式的“斗争”，既反映了无可奈何的怨懣，更反映了人民的乐观和人民的耐性。当然，我们希望这种乐观和耐性不再受到践踏，但在作品反映的这一类实际问题面前耐心一点仍然是必要的。在生产力如此低下，城市人口压力如此沉重的情况下，解决皮德宝的困难说来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但“溜主任”连最起码的帮助也不提供，实在丧失了共产党干部的气味。害得老光棍王凤祥去背十字架——老实说，用这种办法去解决矛盾其实是令人遗憾的对于矛盾的回避；不过，通过

这一描写却也反衬了“溜主任”的冷酷。文章得失，寸心难知啊！

短篇小说的题材是广泛的，作家的笔触正在伸向今天的和昨天的，重大的和细微的，政治的和心理的、伦理的和美学的各个方面。高晓声的《拣珍珠》，这是对于遭到破坏，因而变得油滑、世故、市侩化了的当今社会风气的挑战，是对于农民的朴实、真诚、正派的优秀品质的颂歌。这是一篇真正的“歌人民之德”的小说，同时也是一篇“缺市侩之德”的小说。拣珍珠，拣珍珠，作品的命题是意味深长的，珍珠就在人民当中，只有脱离了人民群众的孤独者才感到周围一片黑暗。

韩蕩丽的《湮没》是感人至深的。作品主要提炼了两个在火车上的场面，而把一切背景、一切关于人物命运和故事情节的描写压缩、或者“虚”到后面。两个场面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后一个等于是诀别的场面，更象刀刻一样地留在读者的心上。作品没有正面写蔡源的遭遇，但读者可以想象得出，这样的遭遇又何止蔡源一人！作品没有正面地写反右斗争的扩大化，但是，作品令人信服地告诉我们，不仅林彪、江青式的魔鬼，就是我们的好人的“左”的错误，也会毁灭多少人的青春、幸福、前途，乃至生命！作品没有写“我”的爱情如何强大、坚贞、神圣，相反却写“我”早就不想爱了，努力忘却并且真的忘却了，“我”想重建个人的生活，去爱一个别的人，这是真诚的

也是无罪的。然而，“作梗的都是他”，“……到了该作决定的时刻，他的影子就横在我和别人之间……脸上是那个诀别的惨笑……”以致“我”越来越恨蔡源……这真是惊心动魄而又细致入微的真实！惊人的真实！看到这里，使人根本忘记了它是小说，而觉得那是我们的一个好友，一个姐妹在叙述自己的血泪故事。在小说创作中，“匠心”当然是要有的，然而，任何匠心也代替不了真情。只有匠心服务于真情，最后匠心溶解在真情当中，使人感不到任何匠心的时候，才是最成功的匠心。作为文坛新人的韩蕩丽的这一篇作品的成功，在这方面是颇为发人深省的。

李陀的《雪花静静地飘》和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都是写知识分子的爱情的。李陀的作品有一种淡淡的美，小说中的陈磊、张薇薇和郑祖因，三个人物代表着三种精神境界，爱情应该是精神上的攀登，哪怕是偶然萌发的，不成功的爱情也罢，对于一个向上的人来说，它会成为一个向上的力量。让我们的青年，我们的读者学会怎么样去爱吧，真正的、崇高的爱情的体验，不论是幸福的体验还是张薇薇的忧郁的和《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妈妈的无限痛苦的体验，都将使人们的灵魂更加丰富。

这里，我们要特别谈一谈张洁及她的《有一个青年》和《爱，是不能忘记的》。张洁的名字出现在报刊上还不那么久，然而象一颗新星一样，一出现在天空，就以它独特的光辉吸引了人们。（不要以为说“星”有什么过分，这些年，我们在侮辱人的时候是那么慷慨，而在鼓舞人的时

候却又那么吝啬。如果连点星光都没有，又何必提笔写文章？每个作家都是一颗星，哪怕是一颗小星，卫星，流星，扫帚星……)细腻的抒情，深沉的思索，对于一切美好的事物的单纯而又执着的信念和追求，对于人类的精神世界中所孕含着的（哪怕是埋得很深很深的）有价值的矿藏的开掘，自由的——有时候多少有点玄乎乎的心理分析，却又充满了城市生活的实感、幽默感，严肃而又俏皮的、略显“欧化”的语言，这些，构成了她的作品的独特风貌。从“有一个青年”的粗鲁的、没有教养的行为后面，张洁看到了他的努力向上的心。一个心里是“藏着无数脏话的仓库”，连“图书馆都一次也没有进过”的小伙子，当他终于在那个可爱的姑娘（当然，更主要的是开始了新长征的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民）的鼓励下，迈开双脚，“咬着牙赶上去”了的时候，他感到了由衷的快乐。这种诚恳的理想主义，应该说是描写“伤痕”的作品中的一个新的、动人的调子。《爱，是不能忘记的》写的是人的感情，人的心灵中的追求、希冀、向往、缺憾、懊悔和比死还强烈的幸福与痛苦。我们可以同意或者不同意这种对于爱情的柏拉图式的解释，我们可以同意或者十分不同意作者对于“生儿育女、厮守在一起”、对于“千百年来的社会习惯”的嘲笑，我们甚至也许可以友善地进言作者在维护自己的观点和情绪的同时保持一定的分寸感，但是，作品的主题仍然不在这里。以为靠这篇小说可以指导恋爱婚姻和以为从《乔厂长上任记》中可以找到企业管理问题的答案一样，是“过

于执”了。小说写的是人，人的心灵。难道人的精神不应该是自由驰骋的吗？难道爱情不应该比常见的和人人都有的更坚强、更热烈、更崇高、更理想吗？难道一个崇高的、有觉悟的、文明的人，不应该终其一生去追求去寻找去靠拢那分明是存在着的、又明明是不可能完全得到、不可能完全实现的更上一层楼的精神境界吗？难道人生的意义，在某个方面，不也正在于这样一个灵魂的不断升华和不断突破吗？说真的，落后的生产力，落后的文化，贫困，封建专制，以及我们自己的“左”的专横的影响，不是使我们的许多人的灵魂被压扁了，因而太缺乏感情，太缺乏想象了吗？

当然，爱、心灵、精神是脱离不了生活，脱离不开地面的。世俗的，红尘的，喧闹的生活永远也不应该被忽视，被贬低。如果掌握得好，写人的心灵与写生活，写人民群众的脚踏实地的斗争应该是不矛盾的。任何一个作家，任何一篇作品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在我们为张洁的一些作品喝采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她有进一步的充实和突破。希望她能把哲理与艺术感觉，内省与社会生活的反映更好地结合起来。同时，我们也全然不应该忽视风格与之完全不同的，比较土、比较扎实的另一种类型的作品。象陈忠实的《徐家园三老汉》中的黄土高原的芳香也是令人赞美的，可惜构思立意都“平”了一些。

一年来，《北京文艺》上发表了不少好的，受欢迎的短

篇小说。从这个集子里，我们可以看到，在编辑同志的心血和汗水的浇灌下，《北京文艺》正和全国各兄弟刊物一道勇猛前进，成绩是令人欣慰的。《北京文艺》的订户和零售数额都在不断增加，九月的《小说专号》重印了一次仍然不能满足读者的要求，便是证明。我们要充分肯定这些成绩。和当前各报刊时有介绍的台湾的、港澳的以及外国的一些短篇小说相比，我们完全没有理由妄自菲薄，完全不应该认为外面的月亮比自己的亮。“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文章憎命达”，“愤怒出诗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经历的坎坷和磨难，已经促进了和正在促进着我们的文学的思想上和艺术上的成熟，有时候甚至是思想上和艺术上的飞跃。现实主义，塑造人的灵魂，革命的人道主义、人情味和美好的人性，干预生活、揭示矛盾以及娱乐性和趣味性，对于心灵的愉悦、润泽和温暖，从来没有象这两年，特别是这一年这样在短篇小说的创作中得到不断进展和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现在的文学，是最有理想也最富批判性，最勇敢也最负责，最真实也最美好的一种文学。我们要珍惜党的文学的成就和开始恢复了的、难能可贵的信誉，我们要谨防“左”的教师爷和右的可怜虫否定和破坏我们的文学事业的任何尝试。那种认为现在的创作“缺德”，会成为“闹事”的根由，随时准备把从“四人帮”那里继承过来的“帽子”和“棍子”丢过来的文艺刽子手的观点，和那种认为凡是国内的“官方”刊物上的作品，一律没的看的观点，都是闭着眼瞎说，都是一种无知而愚

蠢的偏见。

但是，与我们的广阔的、沸腾的而又是艰难的生活相比，与我们的精神上比十年前，比三年前甚至比一年前发展了很多的读者的需要相比，我们的文学还是太贫乏也太单调，太浅露也太粗陋了啊！《北京文艺》一九七九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中，还缺乏正面地描写我党和我国人民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和转移工作重点所作的斗争，正面地揭示社会生活中的尖锐矛盾——党和人民与专制主义、官僚主义、特权思想、思想僵化、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斗争。还缺少时代的强音，“四化”创业者的形象，为维护民主和法制，为维护安定团结而斗争的热情的公民的形象。还缺少那种立志改革，既有胆略又有智慧，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的当代英雄的形象。我们也还缺少那种真正深刻的，大无畏的，经得住咀嚼和回味的对于生活中的重大问题的思索。我们的许多作品还缺少那种大艺术家、大思想家的胸怀和气魄。在新的形势下，人民精神上的成长，人民精神上的新的希望、追求、欢乐与苦恼，人们精神上所受到的新的考验还表现得很不“够劲儿”。同时，我们的人物塑造也还不够坚实和深刻，还没有塑造出够多的，各式各样的典型人物。我们常常说反对官僚主义和思想僵化，但我们的小说中还没有出现那真正站得起来的，绝非一捅就倒的纸人的令人信服、令人深思的官僚主义者和思想僵化者。我们又常常批评那些对四项基本原则发生动摇的，或者“看破红尘”的人，但我们的小说中同样也少有出现这样的活

生生的具有批判色彩的人物。我们的一些作品的主题思想往往比较简单，比较外露，令人一览无遗。我们的形象思维也还不那么发达，风景，环境，氛围，肖像，细节的描写还缺少那种精确的、迷人的、永恒的艺术魅力。

许多时候以来，人们都责备短篇小说写得太长了。其实问题不在于篇幅，长的不一定不好，短的也未必佳。举契诃夫的例子只举《万卡》和《苦恼》，不举《草原》和《第六病室》，这不是一种郑重的态度。问题在于，我们的短篇小说的构思和处理手法还不够多样，那种抓住生活的一个镜头、一个断面、一个侧面、一点情绪、一滴水、一斑、一瞬而写的短篇小说确实是少了，而那种用显示矛盾——发展（或回溯）矛盾——解决矛盾，亦即提出问题，展开问题和回答问题的三段结构写成的小说却比较多，这种情况下，光靠“压”和“砍”，是缩短不了小说的篇幅，更提高不了说的**质量的**。应该说，这种情况下的压缩是否明智，也是可疑的。同时，我们也得承认，那种虽写断面，却能纵横挥洒，尽情铺染，刻划入微的长而不冗，长得“过瘾”，长得有份量的“长短篇”，也绝对不是太多了啊！总之，我们短篇小说创作的路子还不够宽，新的探索还不够大胆。那种一篇作品成功，千篇跟随模仿，或者一种题材被肯定，大家一拥而上的创作上的拥挤、乃至“撞车”现象，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一种没有出息的现象啊！文学即创新，无新即无文学。甚至同一个作者，也不能轻车熟路，老沿着一条胡同走。创作的艰难，创作的迷人，不正在这里吗？

下笔千言，离题万里，谈作品已近闲聊，发议论更象空话。如果有哪位友人将上一军：“那么你写的又怎么样呢？”笔者只能举手，缴械，变作一只寒蝉。变蝉之前，再说一句：为了提高短篇小说创作的水平，需要有更经常也更直率的讨论。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让我们共勉。

王 蒙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于北京